



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文库·第二辑

中国特色 商会组织体系构建

以上海为视角

汤蕴懿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文库·第二辑

中国特色 商会组织体系构建

以上海为视角

汤蕴懿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特色商会组织体系构建/汤蕴懿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文库)

ISBN 978-7-5520-1583-6

I. ①中… II. ①汤… III. ①商会-研究-中国
IV. ①F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4095 号

中国特色商会组织体系构建——以上海为视角

著 者: 汤蕴懿

责任编辑: 应韶荃

封面设计: 风行水上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开

插 页: 12

字 数: 196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1583-6/F·444

定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引 言 中国特色商会组织体系构建:目的和作用	1
第一节 市场经济完善中的商会建设	1
第二节 以上海作为区域考察对象	2
第三节 本书的框架结构	5
第一章 商会治理理论体系及评述	8
第一节 商会治理理论体系	8
第二节 商会治理理论的评述	18
第二章 经济治理中的商会发展与阶段特征	20
第一节 西方行会组织的演变	20
第二节 西方国家商会时期	23
第三节 西方商会的国际化时期	27
第四节 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商会的政策调整	30
第五节 几点结论	30
第三章 上海商会发展的历史传承与制度特点	33
第一节 上海总商会由来“三部曲”	33
第二节 上海总商会的基本制度	36
第三节 上海总商会的主要功能及借鉴	40
第四节 上海总商会(市商会)的结构性关系	43
第四章 市场经济下上海商会治理的新环境	47
第一节 总体性社会下商会的单一功能	47

第二节 市场经济环境下商会发展的环境变化	52
第五章 上海外国商会发展问题研究	59
第一节 对上海外国商会的法律界定	59
第二节 上海外国商会发展现状	61
第三节 上海外国商会的关系网络	64
第四节 外国商会管理模式比较	69
第六章 上海外国商会在区域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75
第一节 上海外国商会的生成过程	75
第二节 上海外国商会的核心发展要素	78
第三节 上海外国商会的治理	79
第四节 经验与启示	83
第五节 上海外国商会在区域公司治理中的正反作用	86
第七章 上海异地商会发展问题研究	88
第一节 在沪异地商会的基本情况分析	89
第二节 在沪异地商会的治理和运行	92
第三节 在沪异地商会作用的发挥	95
第四节 在沪异地商会管理体制的问题及分析	96
第五节 异地在沪商会管理体制还未完全建立	98
第六节 加强异地在沪商会管理的对策及建议	100
第八章 上海市行业协会发展问题研究	102
第一节 上海行业协会发展现状	103
第二节 上海以民营企业为主的行业协会作用	108
第三节 当前上海行业协会的管理体制及瓶颈	113
第四节 借鉴与启示	115
第九章 “两个健康”目标下地方工商联发展问题研究	118
第一节 上海地方工商联的发展历程	119
第二节 上海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发展的新环境、新目标和新要求 ...	120

第三节	上海“两个健康”发展需求分析	121
第四节	当前上海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发展中的问题	124
第五节	推进上海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发展的三点建议	126
第十章	上海商会体系发展的递进逻辑	134
第一节	商会作为一种交易治理机制	134
第二节	区域商会传统体系的解构过程	136
第三节	新主体的进入及区域商会体系建构过程	138
第四节	地方商会作为新治理主体的制度安排	145
第十一章	新时期上海商会新体系建设的初步思考	148
第一节	新时期中国特色商会体系建设的新需求	148
第二节	中国特色商会体系建设的现实挑战和经验借鉴	150
第三节	国外商会模式对我国商会建设的借鉴与启示	156
第四节	完善商会组织体系建设的战略思考	159
第五节	具体的思路设计	162
第十二章	上海新社会阶层的商会纳入问题	168
第一节	上海新社会阶层纳入商会发展的前期基础	168
第二节	上海新社会阶层商会工作面临的新特点	169
第三节	上海新时期新社会阶层统战工作亟待加强的重点	171
第四节	完善新社会阶层商会参与的对策建议	173
参考文献		178
后 记		182

引言 中国特色商会组织体系构建： 目的和作用

中国商会的组织体系建设,是重大的经济问题,更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商会组织不仅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力量之一,更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从维护国家政权稳定的政治治理层面来看,还是从市场经济组织和社会治理层面来看,抑或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层面来看,现代商会的建设与发展都关乎国家治理,其价值和意义,既是现实的,也是长远的。^①

第一节 市场经济完善中的商会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在市场机制和政策引导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商会建设初具成效,为后续的深化改革创造了条件。2013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出行业协会商会类等四类社会组织实行直接登记,开启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由双重管理向一元管理的体制转轨过程;《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的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及商会(行业协会)与行政脱钩的改革方案实施,都为新时期商会发展提供了体制机制上的保障,也为构建经济统战新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在制定技术标准、规范行业秩序、开拓国际市场、应对

^① 林尚立:《中国特色商会关乎新常态下的国家治理》, <http://www.chinanews.com/cj/2014/11-12/6768739.shtml>。

贸易摩擦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提高协会商会组织协调、行业自律管理能力。坚持行业协会商会社会化、市场化改革方向,推进行业协会商会工作重心转向为企业、行业、市场服务。支持协会商会加强与国际行业组织的交流合作,建设国际化服务平台,改革内部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境外中资企业协会商会建设。”这些要求为新时期中国商会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商会健康发展但面临着新的重大挑战。目前,全国私营企业已达到 900 多万户,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已超过 5 000 万人。各类商会也快速增加,20 余年来,工商联各类商会数量增长 122 倍,全国范围内乡镇商会和街道商会覆盖率已达到 51.4%和 61.5%。各级各类商会在解决民营企业发展困境、促进转型升级、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与此同时,新形势下的商会建设正面临艰巨挑战。例如,对商会在工商联工作全局中的基础性地位认识不足、商会的数量和质量与非公经济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对商会进一步发展的指路思路有待明确等。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三个基本要素(政府、企业与商会等工商社团)中,商会建设不仅明显滞后于其他两大要素,其与政府和企业间的互动方式也缺乏深入研究,这一定程度上已阻碍了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节 以上海作为区域考察对象

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和全球特大经济城市,其商会发展始终和经济发展融合并互为一体。对上海商会体系的研究和考察,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商会建设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也为各地商会建设提供了前期探索和经验。同时,对上海商会发展进行适时总结思考,更是能为深化推进上海经济转型提供依据。

对于上海地方商会的研究,也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对中国商会研究范式的转型探索。尽管商会已经历了数百年历史,但国内学界对商会理论的研究比较薄弱,直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组织理论、社团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等相关理论被持续引进,并得到运用,才对商会找到了有效的分析工具。现代商会作为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中的“舶来品”,国内在引进、消化、运用上付出了诸多努力,也逐渐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中国商会研究视角,如对中国传统商会文化和组织制度的研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角度进行

的研究,以及对温州商会等地方商会的研究,这些研究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借鉴。

然而,市场经济中商会主体的发育,很大程度上是扎根于区域经济环境和制度建设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不同区域的经济结构、企业主体特点、商业文化和政府管理方式,均极大地影响着商会体系的建设。上海地方经济发展在经历了对外开放、区域一体化、创新驱动等各个发展阶段后,其商会体系逐渐形成,且内涵逐渐丰富,本书的主要研究即围绕这些内容展开。

一、非公经济已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

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上海推进“四个率先”、建设“四个中心”和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撑。2013年,上海市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11 006.76亿元,增长8.4%,其中私营及个体经济增加值5 244.17亿元,增长7.8%。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上海市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上年的50.7%提高到51%。

特别是随着上海市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上海民营经济生产总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提高,2007—2013年分别为22.4%、23.5%、23.7%、24.1%、24.3%、27%、31%。2012年上海民营经济实现税收1 933.20亿元,占全市税收总额的26.2%;完成投资1 552.38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9.5%。

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政策引导、资金扶持等多方面鼓励和支持下,近10年来,一大批民营企业服从国家战略逐渐“走出上海、服务全国”,在全国布局中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的双丰收。

同时,非公经济内部的产业格局也进一步优化。2013年,上海私营企业中从事第一产业的有2 265户,占私营企业总数的0.3%;从事第二产业的有155 439户,占19.7%;从事第三产业的有692 760户,占80%。全年注销私营企业55 926户,比上年增长33.8%。

二、“制度”创新已成为上海新一轮改革的动力

(一)“营改增”制度红利

外省市在上海投资的异军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海在2012年率先试点的“营改增”。这项制度红利吸引了一批长三角的企业。2013年上海全年外省市在沪新设私营企业8.8万户,占全市新设私营企业数的76.7%,比上年

增长 3.6%。至年底,外省市在沪的私营企业共 52.5 万户,占全市私营企业总数的 66.5%,比上年增长 14%。外省市来沪投资前 3 位的是浙江省、福建省和江苏省,投资行业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及制造业居多。

(二)“中国(上海)自贸区”建设制度红利

上海自贸试验区自 2013 年 9 月 29 日挂牌半年多来,货物通关时间平均缩短 2 至 3 天,节约物流成本 10%左右;市场活力也随之明显释放,截至 2014 年 3 月底,区内海关新增注册企业 2 438 家,总数达 7 392 家,呈快速增长、多元发展态势。

(三)“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制度红利

非公经济在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布局态势,民营企业产值已占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半壁江山,在研制运载火箭整体舱段、开发最新高端光学膜、绿色智能变电站、工业机器人等行业更是形成了一批领头羊。

(四)文化体制改革制度红利

上海已有 100 多个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出现了产业门类集聚、功能定位明晰、部市合作共建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许多园区已从一般房屋租赁到提供完备物业服务,并逐步发展到帮助企业孵化、开展各类咨询、提供金融服务、参与企业发展等注重园区服务能级提升和园区运营模式创新的管理。另外,上海在全国网络视听服务市场的份额已占 70%左右,网络游戏服务市场份额近 50%,动漫产业产值达 51 亿元,在网络财经服务、网络电子商务、网络休闲娱乐服务、网络远程教育服务等领域都位于国内领先地位。

三、市场经济下上海商会体系建设初见成效

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先行者”,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初步形成了内外兼顾、新旧并重、综合发展的商会发展格局。上海作为近代中国商会的发源地,也是远东最大的商业城市,各国商人荟萃,各国商会云集,如上海美国商会成立于 1939 年,是美国在海外的第一个商会,这些为上海积累了独具特色的商会文化。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上海浦东开放作为国家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上海在开埠 100 多年后,重新成为世界开放的窗口、外商投资的热土。大量跨国企业集中涌入上海,上海美国商会、上海日本商工俱乐部等外国商会,也随着它们本国雇主的进入而重新登陆上海,形成了上海地方外国商会云集、国内

商会和国外商会并重的区域组织格局。

21 世纪初,随着中国经济的整体提升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国内各区域间的经济联动进一步强化。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长三角的龙头城市,其良好的人才优势、公共服务设施和制度环境带动了国内资本的新一轮投资,先期进入上海的外地企业也逐步发展壮大,引发了上海异地商会的异军突起。和以往两地政府为主的商会运行方式不同,新时期异地商会的发展更多体现了民营企业自主的运行格局。

在国家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新目标下,上海又在全国率先启动了区域经济结构转型。以“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为主的新经济发展,使得上海在近五年中形成了一大批新兴领域和新社会阶层企业家。他们在经济结社中充分体现了互联互通、兼容并蓄的精神。在政府的鼓励支持下,新兴领域的行业商会、新型商会形式层出不穷,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新平台。

第三节 本书的框架结构

本书共有十二章,在分析逻辑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到第三章为第一部分,通过对商会发展基本理论、商会发展阶段及规律和上海商会发展中的文化基础的探讨,为后续的分析提供基本理论框架和依据;第四章到第十章构成了本书的第二部分,重点通过分类研究的方式,对上海经济发展不同时期不同商会的发展进行具体研究分析;第十一、十二章为第三部分,探讨中国未来特色商会体系建设的战略框架,以及如何围绕新社会阶层这一群体,加强新时期商会的组织能力建设。

第一章为商会治理理论及评述,系统介绍了商会治理理论体系,包括非营利组织理论、经济治理理论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多重角度,对商会这一市场中介组织的综合特征进行描述。

第二章为经济治理中的商会发展与阶段特征,分西方行会组织的演变、西方国家商会时期、西方商会的国际化时期和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商会的政策调整四个发展阶段,系统介绍了商会在经济发展各个阶段的运行特征,对商会作为市场经济的结构性主体进行研究。

第三章以上海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区域商业传统文化对商会发展的影响。民国时期的上海总商会,是近代中国成立最早、影响巨大的城市综合商会。开埠后,在市场经济和租界效应的双重作用下,近代上海民族资本主义形态和社

会形态开始萌芽,集中表现为民族经济与外向经济并存、民间社会独立、公民社会崛起,并逐渐形成“注重契约、自主自律”的上海商会文化。

第四章为市场经济环境下上海商会治理的新环境。这一部分采用了“总体性”社会的分析方法,诠释了计划经济下地方经济的单一功能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主体的变化、市场环境的变化及地方自主权的扩大。

第五章、第六章为上海外国商会发展问题研究。作为上海改革开放外资的经济中介组织,上海外国商会运用西方成熟的商会运行模式,为上海外资企业提供一系列专业化服务,同时也对尚不成熟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带来了冲击,推动着地方经济治理环境的变迁。

第七章为上海异地商会发展问题研究。这章主要围绕上海异地商会的发展现状、运行特点和组织管理展开。异地商会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产物,既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商帮文化相连,也兼具了新时期中国经济自组织的先期特点。同样作为非属地商会,上海异地商会和上海外国商会在内外商会的运行模式上各具特点。

第八章为上海行业协会发展问题研究。除了综合性的商会组织以外,上海近年来还积极推动新兴领域行业协会建设。与商会相比,行业协会的单一经济功能更强,前期改革更充分,通过上海地方政府积极鼓励引导,行业协会的专业化发展和社会化服务已对上海经济转型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九章为上海工商联转型问题研究。对于在地方商会体系建设中,市场经济转型中如何撬动存量改革,本章做了初步探讨。工商联作为区域商会最重要的主体,在“两个健康”的目标引导下,内部更注重三性的和谐统一,外部也更注重在地方商会网络中核心作用的发挥。

第十章为上海商会体系发展的逻辑演进过程。这部分运用制度经济学的视角,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对上海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市场经济建设、商会发展特点、管理体制变化中的内在规律进行研究,明确商会作为市场中介组织,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服务、协调、自律等各项功能的发挥。

第十一章为新时期上海商会新体系建设的初步思考。这部分采用了“需求—供给”的分析方法,探讨新时期上海商会新体系建设的思路、框架和重点。从需求看,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加快了经济结构、经济主体和社会运行等多方转型,都需要中国特色商会建设更有力的支撑;从供给看,市场经济中已经存在了大量的民间商会群体,如何在政府职能转变的新背景下,重塑地方商会发展体系正当其时。

第十二章为新社会阶层纳入商会体系建设问题。作为新商会体系中最重要增量部分,对于当前新社会阶层的纳入,首先需要更新观念,其次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性安排。针对这一群体的特点,笔者提出了加强顶层设计,围绕政治融合构建新型政商、政社关系;打通人才、平台、社会三项要素,实现群体统战工作的融会贯通;更新观念,实现商会体制机制上的创新等建议。

第一章 商会治理理论体系及评述

第一节 商会治理理论体系

一、非政府组织理论

非政府组织是英文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简称 NGO)的英译。与其相类似的概念还有非营利组织(NPO)、第三部门(Third Sector)、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等,在不同的使用情境下,可能各概念有所区别,但将其严格区分并非易事。总体来说,这些社会组织大都具备了非营利性、民间性、组织性、自治性、志愿性的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的特征。

非政府组织最早出现在 17 世纪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当时用来指一些带有政府色彩的社会团体以及主要开展慈善救济等社会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到了 19 世纪末期,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非政府组织数量更多,活动范围更广。比如致力于社会变革、社会改造的工人团体不断涌现,致力于科教文卫等公共事业的社会团体的出现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政府组织开始登上国际政治的舞台,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更是在各国悄然兴起。正如萨拉蒙教授所说那样,“我们是置身于一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之中,历史将证明这场革命对 20 世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 19 世纪后期的世界的重要性”^①。目前,由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第三部门的平均规模大约是:占各国 GDP 的 4.6%,占非农就业人口的 5%,占服务业就业人口的 10%,相当于公共部门就业人口的 27%。在当代的许多国家和地区,

^① 参见何增科:《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研究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5—30 页。

市民社会组织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掌握着相当数量的社会资源,担负着特定的社会管理职能,对社会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而治理兴起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来自于此。^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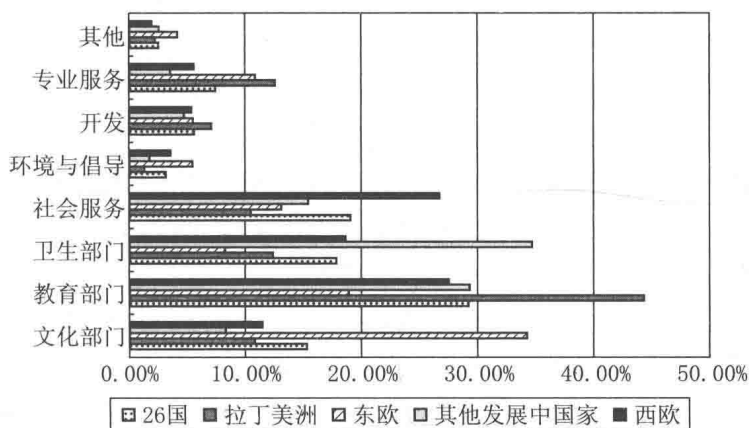


图 1-1 1995 年 26 国公益部门就业领域统计

资料来源:丁竹元:《公共服务与非营利组织的作用》。

在西方学术界热衷于对非政府组织治理问题进行理论研究的背后,有其特定的现实背景: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社会对社会资源的配置理论先后遭遇了市场和国家的双重失灵,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从市场和政府之外寻找另外一种力量,以解决资源优化配置问题。非政府组织由于其灵活性、志愿性和公共性特点,被学者们作为新公共行政的主体。西方学者之所以提出治理概念,主张“善治”,就是希望通过由非政府组织参加的多元化协同治理来对付市场和(或)国家协调的失败。

治理理论的兴起为正在蓬勃发展的非政府组织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第一,非政府组织可以弥补市场和政府的失灵,提供公共服务。市场失灵理论认为,由于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两个属性,单一的市场体制既不能有效提供公共产品,也难以有效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更无法解决众多的社会问题。同样,由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缺少差异性和经济性,政府与市场一样也存在着失灵。在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情况下,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非政府组织不仅可以向需求较高的人群提供额外的公共物品,向需求特殊的

^① 萨拉蒙等:《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贾西津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 页。

人群提供特别的公共物品,而且其凭借其志愿性、服务性、公益性、创新性等优势,能较有效地把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从而克服市场和政府有可能导致的不公正或低效问题。

第二,非政府组织可以克服契约失灵,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契约失灵理论强调,由于信息不对称关系的存在,消费者缺少足够的信息或者由于服务购买者不是最终的消费者,因此消费者无法在现行的契约制度下,有效地监督商品生产者或服务供应商的行为。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的特征使得它们能够成为降低监督成本的一种替代性制度安排,因此,人们愿意把这类难以监督的服务委托给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来承担,而拒绝市场化的选择或国营机构的安排。

第三,非政府组织可以充当国家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新社会运动理论所强调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人们许多新的共同要求无法在现有的制度安排内得到解决,而非政府组织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沟通渠道和问题解决途径,或是向政府施加压力以创构新的制度或是以创造性的办法解决最急迫的问题。非政府组织具有国家政府无可比拟的社会沟通优势。非政府组织一般既能深入到社会基层的民众中间,又能同政府保持较密切的关系。它们可以宣传和普及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教育和动员民众,使他们认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又可作为传达民情的渠道,反映民众的愿望和意见,去影响政府政策和计划以使其更适合民众的需要。非政府组织还可以作为一条重要的纽带,在其所服务的社会基层民众同企业、学术界、新闻媒介以及社会公众之间发挥着沟通作用。在国际上,非政府组织可以发挥更为广泛的沟通作用。非政府组织是具有国际性的组织体系。在非政府组织的国际联系中,各非政府组织之间互通信息,进行协商与合作。

同时,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发展也为治理理论提供了实践“平台”。一方面,非政府组织的加盟,推动了多中心、多层级分散的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的形成。作为公民社会的实体行动者,非政府组织在促进政治管理过程从政府为中心的、等级的、命令式的统治(government)向多中心的、自主的、合作管理的治理、善治的转变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对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发展中国家状况总体反应中的第三个要素,公民社会是经济领域中市场和政治领域中民主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对应物。”^① 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在各国

① 戈登·怀特:《公民社会、民主化和发展:廓清分析的范围》,《民主化》1994 年第 3 期。

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众多不同层级、不同领域行动者的合作和竞争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并在国内和国际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例如:欧盟成员国普遍认识到国家能力的有限性,强调发挥公民社会在“新治理”中的作用。美国在“重塑政府”的过程中也赋予非营利部门以重要的角色。日本政府与非营利部门建立起“委托—代理”关系,非营利部门受政府委托承担着许多重要的工作。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根据本身的活动方式特点,促成了不同治理主体间建立伙伴关系进行合作管理,进而促进治理方式的变革。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治理方式受到多方面的挑战,公民社会、私营部门、跨国公司、国际组织都要求参与国际和国内事务的管理。公民社会积极推动不同层级上的公民参与(civic participation or engagement),并把有无公民参与作为判断国际国内决策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为此,他们呼吁增加透明度,提供参与渠道,提倡建立法制等。他们还通过联盟的方式,促使政府改善自身形象,更加负责任地行动。总之,由于对公民社会行动者有着重要的利害关系,所以他们在推广治善的基本标准、促进治理方式的变革等方面,发挥着密切作用。

二、经济治理理论

无论国内国外,对商会经济治理理论研究一直十分缺乏,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交易成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社团理论等的发展,商会的经济治理理论研究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分析工具。

(一) 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由于普遍存在着由市场组织外部性交易成本产生的市场缺陷特征和由非市场组织内部性交易成本产生的非市场缺陷特征,而商会在管理服务市场方面相对单纯的市场组织(以企业为主体)和非市场组织(以政府为主体)是可以有效节约交易成本的,因此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不应代替商会进行商会功能(产品、服务)的生产或提供,以避免高昂的交易成本。

市场缺陷,一般包括垄断、(负的)外部性、公共产品提供不足、信息网络不健全和财富分配不公。造成市场缺陷的主要因素是市场组织(企业)行为的外部性。造成企业行为外部性的原因在于单纯的市场力量无法促使企业决策时其边际私人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相等,除非进行科斯所认为的“产权内部化”。并且,“产权内部化”也只对解决“公共地悲剧”有效,而无法避免对石油资源、海洋渔业、臭氧层等流动性资源的破坏。此外,“产权内部化”的边界如何界定是一个难题,能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利益相容的集团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必